

試論元代官方史學的兩重體制

時 培 磊*

摘 要

元代官方史學實行的是一套兩重修史體制。本文首先分析了產生官方史學兩重體制的政治背景，主要是元代政治的二元體制。其次本文具體分析元代官方史學的兩條線索。在蒙古史學傳統下，元代仍然由必闡赤記錄大汗言行，而且元代歷朝都在進行《脫卜赤顏》的纂修。在中原王朝史學傳統下，元代設立了起居注和翰林國史院，並且還進行時政記、實錄、前朝史、典制書和方志書等的編纂。元代官方史學的兩重體制，使其在中國古代官方史學的發展中獨具特色。

關鍵詞：元代、蒙古、史學、兩重體制、必闡赤、脫卜赤顏

一、前 言

中國史學素稱發達，梁任公曾言：「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¹而中國古代官方史學的興盛，則是中國傳統史學如此發達的重要原因之一。喬治忠指出：「中國的傳統史學，存在著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兩條相互聯繫的軌道，這種特點是中國古代史學及其連綿不斷發展的重要原因。在一定的意義上，沒有賡續不衰的官方史學，就沒有中國古代史學的繁榮興盛局面。」²此言切中肯綮，只有

收稿日期：2007年12月6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年4月23日。

* 作者係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與日本愛知大學大學院中國研究科聯合培養博士生。

1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16。

2 喬治忠，〈中國古代官方史學的興盛與當代史學新機制的完善〉，《河北學刊》2005.2

把握住這一點，才能體會中國古代史學緣何於世界史學中獨樹一幟。我們只有對官方史學有比較系統地研究，才能對中國古代史學有更深層次的認識。

從中國古代官方史學的發展角度看，處於政治文化二元性背景下的元代官方史學，呈現出與其他朝代不一樣的特點。學術界在元代官方史學的個案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有意義的成果。³元朝建立後，統治者一方面學習中原王朝的官方史學傳統，另一方面又堅持蒙古國時期的修史傳統。二元體制下的元代官方史學也具有兩重性。

關於元代的兩重修史制度，學術界此前已有涉及。王明蓀曾指出：「筆者懷疑元代史官制度具有雙重系統，其一是朝廷給事中等修注官，至國史院的編修、修史等，其二是宮禁『怯薛』中的『必闍赤』仍執行其傳統的『爲天子主文史』之職，是以有『脫卜赤顏』之史書，秘而不得外傳。」⁴王曉欣也曾指出：「元朝實行兩套班子、兩種文字的修史制度。漢人史臣按中原傳統用漢文記錄皇帝言行和軍國大事，修《實錄》，後來明朝編撰《元史》即以此爲本；由皇帝指定的蒙古、色目官員則繼續進行『脫卜赤顏』的修撰。脫卜赤顏是皇室的秘密記載，修成後即藏入『金匱』，不許人看，即使是修史的史官要參考也不允許。」⁵許多學者都發現了元代修史制度的特殊性，只是還有待於更深入細緻的研究。筆者即在此啓發下，從元代官方史學的角度出發，試圖系統探討元代的兩重修史體制，以就教於海內外專家。

(2005.3): 174。

- 3 如在史官與史館制度方面，王明蓀的〈元代之史館與史官〉（載於《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青峰出版社，1991，頁403-420），是一篇系統探討元代史館與史官制度的文章。此外，張帆〈元代實錄材料的來源〉（《史學史研究》1988.4(1988.12): 68-71）及〈元代翰林國史院與漢族儒士〉（《北京大學學報》1988.5(1988.9): 75-83）、薩兆鴻〈元翰林國史院述要〉（《北京行政學院學報》1999.1(1999.6): 66-70）等文章對此問題也都有所涉及。再如在官方修史成果方面，（蒙古）沙·比拉著，陳弘法譯，《蒙古史學史》（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周少川《元代史學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等著作，以及穆德全〈論元代史學的成就〉（《史學月刊》1984.4(1984.7): 30-35）、李淑華〈蒙古國書與蒙元史學〉（《黑龍江民族叢刊》2005.1(2005.2): 50-55）等文章都是從整體角度涉及了元代官方修史成果的問題，對元代實錄的纂修、遼金宋三史的纂修、《經世大典》和《元一統志》等典志書纂修等元代官方重要的修史成果都作了研究。

- 4 王明蓀，〈元代之史館與史官〉，《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419。

- 5 王曉欣，《一代天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43。

二、漢法與「國俗」並行的元代

從官方史學角度講，元代與其他朝代的最大不同在於其蒙漢兩重體制的並行。而這種兩重性又是在元代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元代是中國史上最特殊的一個朝代。這種特殊性就表現在元代既行漢法，又存「國俗」。這種蒙漢二元體制又是經歷一個過程才形成的。

1206年，鐵木真召集蒙古貴族、那顏們在斡難河源舉行忽里臺（大聚會）。在九斃白羆下，鐵木真被推舉為全蒙古的大汗，並根據神巫闊闢出的提議加上尊號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建立的這個新政權，被稱為大蒙古國。成吉思汗即位後，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逐漸建立和完善了政權機構。此後，成吉思汗發動了大規模的對外軍事征服戰爭。在征服的過程中，蒙古內部也進行著爭奪汗位的鬥爭。蒙哥病死於攻宋前線後，忽必烈和其弟阿里不哥展開了爭奪汗位的激烈鬥爭。最終忽必烈依靠中原漢地的支持取得了勝利。

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即位，在即位詔書中稱：「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建元為中統元年。」⁶通過這份即位詔書可以看出，當時忽必烈既要堅持蒙古舊制又要採行漢法的決心。而建立年號的做法，也是忽必烈學習中原王朝傳統的開始。1264年，忽必烈又改年號為至元，並以燕京為中都。同時忽必烈還「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⁷全面改造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在中央機構方面，忽必烈設立了「總政務」的中書省、「秉兵權」的樞密院和「司黜陟」的御史臺。在地方機構方面，忽必烈建立行省制。此外，忽必烈還採行了其他中原王朝的制度，比如取消官員的世襲制而實行遷轉之法，定賦役，頒俸祿，建立學校，整頓戶籍等等措施。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採納劉秉忠等人的建議，以中都為大都，並且「取《易經》『乾元』之義」，⁸正

6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4〈世祖本紀一〉，頁65。

7 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卷40〈經世大典序錄·官制〉，頁7b。

8 明·宋濂等，《元史》，卷7〈世祖本紀四〉，頁138。

式建國號爲「大元」。「昔之有國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爲不足法也，故謂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⁹以「大元」爲國號，表明了忽必烈按照中原傳統來建立大一統國家的決心。

忽必烈中統、至元間的創置，基本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忽必烈等蒙古貴族爲了統治的需要而大量採行漢法，但同時又受到蒙古守舊貴族的阻撓及本身利益的需要等因素的制約，如西北藩王就曾遣使入朝責問：「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¹⁰所以忽必烈實行漢法是有限度的。採行漢法的過程中，蒙古的大量舊俗仍然被長期的沿襲下來。雖然元代也存在其他因素，如回回文化、吐蕃文化等，也都對元代社會產生過影響，但是從總體上來看，「蒙漢法二元性是元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¹¹同樣在政治制度上，元代也存在「諸制並舉」的局面，但是「蒙、漢二元混合結構是其核心，始終居於主導地位」，¹²因此可以用蒙漢二元體制來概括元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徵。

從蒙漢二元體制的整體上來看，元代政治體制可以分成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繼承蒙古原有的草原遊牧制度，比如怯薛制、分封制、千戶制、斡耳朵制等等。另一方面是採行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權制度，比如中書六部制、樞密院制、御史臺監察制、路府州縣制、官吏遷轉制等等。當然也有糅合兩種因素產生的新制度，比如兩都制、站赤制等等。具體來看，比如在刑罰體系中，既保留了中原傳統的「五刑」，又有蒙古傳統的「一個賠九個」、屠宰牲畜時禁抹喉放血等規定。再如銓選制度，元代的官員來源中由吏入官占很大比重，此外元代還一方面繼承蒙古傳統的由怯薛入官，另一方面又採用「漢法」由科舉和國學入官。官員的選用方式上，元代也是既沿襲中原王朝

9 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40〈經世大典序錄·帝號〉，頁4b。

10 明·宋濂等，《元史》，卷125〈高智耀傳〉，頁3073。

11 李治安、王曉欣編，《元史學概說》（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頁5。

12 白鋼主編，陳高華、史衛民撰，《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前言〉，頁2。此外，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和劉曉《元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87）對此問題也持同樣觀點。

的「常選」，又堅持蒙古傳統的「別里哥選」和「投下選」。可見，元代政治體制是一種蒙漢二元的政治結構和組織形式。而這種特殊的政治體制背景，也是元代官方史學中兩種體制並存的重要原因。

三、蒙古草原體制下的元代官方史學

蒙古史學產生於大蒙古國時期。成吉思汗在政權建立初期就組建了自己的私人衛隊——怯薛。¹³ 後來成吉思汗不斷擴建這支專為大汗服務的宮廷衛隊，發展為一支萬餘人的龐大的類似於「中央政府」的機構。據《元史》〈兵志〉的描述，「其他預怯薛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悉世守之。」「其怯薛執事之名：……書寫聖旨，曰札里赤。為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闡赤。」¹⁴ 隨著蒙古開始用畏兀字書寫國言，必闡赤就開始成為了大汗的「筆桿子」。

成吉思汗在接見長春真人丘處機的時候，「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¹⁵ 此後成吉思汗又曾連續三次召見丘處機，並且「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敕誌以漢字，意示不忘」。¹⁶ 成吉思汗之所以如此重視記錄「神仙」的忠言，另外一個目的也在於「且以訓諸子焉」。¹⁷ 此時的成吉思汗已經步入暮年，一生長在馬背上的「一代天驕」居然從馬上摔下來，這也是「廉頗老矣」的明證。作為一位戰功卓著的將領，此時一定會考慮自己百年之後應該為黃金家族的子孫留下一份遺產，當然不僅僅是牛羊和草地。他希望他的子孫能夠記住黃金家族的光榮歷史，能夠繼續完成他未竟的征服事業。因此他的功業、他的「聖訓」都希望子孫和屬民能夠牢記。筆者認為，此時的成吉思汗已經產生了最早的歷

13 關於怯薛的組織情況可參看（日）箭內互著，陳捷、陳清泉譯，《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14 明·宋濂等，《元史》，卷99〈兵志二〉，頁2524。

15 元·李志常撰，王國維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收入《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第13冊，頁46a。

16 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頁5b。

17 明·宋濂等，《元史》，卷202〈丘處機傳〉，頁4525。

史紀錄的意識。蒙古族的史學意識首先從大蒙古國的黃金家族中產生了。

僅僅有了史學意識和汗庭的簡單紀錄，還不能說蒙古史學已經產生，只有當《蒙古秘史》誕生後，蒙古史學才真正產生了。《蒙古秘史》的內容，主要記錄了成吉思汗和窩闊台兩汗的歷史。從成吉思汗的遠祖講起，包括成吉思汗家族的譜系，對外的征服戰爭等等。¹⁸

關於《蒙古秘史》的成書年代、成書地點及作者，目前學術界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其中又主要以成書時間的爭論為最激烈，有1228年戊子說、1240年庚子說、1252年壬子說、1264年甲子說和1276年丙子說，此外還有非一次成書說等等。¹⁹雖然各家意見不同，但是所依據的資料大多基於《蒙古秘史》尾跋第282節的一段文字：「此書大聚會著。鼠兒年七月。於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剌勒地面處下時。寫畢了。」²⁰不管這個「鼠兒年」為哪一年，學術界基本承認它是在「行宮」中寫畢的，而且各家的觀點中大都是與「大聚會」和大的政治變動聯繫在一起的。各家或者以成吉思汗死後的議立新君「大聚會」為準，²¹或者以蒙哥汗即位後為消除窩闊台系的影響，樹立拖雷系一派合法性的政治需要為準。²²因此，基本可以說《蒙古秘史》是處於重大政治變動時期，蒙古統治者為了記錄黃金家族歷史的需要而產生的。而此時，在宮廷中擔任文史工作的「必闡赤」就承擔了這項任務。隨著十三世紀中期的這一部蒙古史書——《蒙古秘史》的問世，蒙古史學產生了。

（一）元代宮廷史官與蒙古翰林院

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以後，仍然保留了蒙古國時期的宮廷宿衛制。其怯薛執事中，仍然有為天子主文史者的必闡赤，這些人大多成為元代的宮廷史

18 關於《蒙古秘史》的情況，亦鄰真作過詳細介紹。參見亦鄰真，〈《元朝秘史》的流傳與價值〉，《文史知識》1985.3(1985.3): 32-37。

19 可參看甄金，〈《蒙古秘史學概論》〉（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頁62-95；烏雲高娃，〈國內關於《蒙古秘史》的研究概況〉，《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3(2001.3): 16-21。

20 額爾登泰、烏雲達賚校勘本，《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頁1055。

21 清·丁謙，〈元秘史地理考證〉，轉引自烏雲高娃，〈國內關於《蒙古秘史》的研究概況〉，頁19。

22 余大鈞，〈《蒙古秘史》成書年代考〉，《中國史研究》1982.1(1982.2): 144-159。

官。從《元史》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擔任必闡赤者，如也先不花在世祖時「世其職，爲必闡赤長」，²³ 再如搠思監「泰定初，襲長宿衛，爲必闡赤怯薛官」²⁴ 等等。此外從大蒙古國的其他汗國中，也可以發現有很多這樣的必闡赤官員。比如伊兒汗國，在《史集》中就有大量關於必闡赤的記載。但是這些汗國中的必闡赤可能職掌範圍更廣泛一些，比如還擔任收稅官等職務，可能稱作「書記官」更合適一些。

我們不能認爲必闡赤就是專職的史官，《元史》中也只不過稱之爲「主文史者」。《黑韃事略》中，解釋蒙古時期的必闡赤爲「必徹徹者，漢語令史也」。²⁵ 漢族的歷史中，令史主要是掌文書者。彭大雅、徐霆他們所看到的必闡赤，其日常的事務工作可能主要就是掌管文書。必闡赤記史的工作，自然不能和當時宋代「起居注」這樣規範的史官工作相比。巴雅爾認爲：「必闡赤的職責中，不僅有『主文』的一面，而且還有『主史』的一面。它既和令史相當，又和太史相當。」²⁶ 蒙古的必闡赤有記史的這一項任務應該是可以肯定的。比如成吉思汗幾次接見丘處機的時候，他都命令身邊的侍從記錄下來。而此時具備這種能力的只有必闡赤。

此外，波斯史料《史集》中，也有必闡赤司職記錄的例子：

因爲當時有一種習俗，君主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要逐日記載下來，凡他們所說的言詞，大部分都有條有理而且含義深奧，所以每個〔君主〕都指定一個近臣記錄他的話。察合台的話由上述維即兒記錄。而合罕有一個畏兀兒人輔弼名叫鎮海。²⁷

後面還記載了察合台和窩闊台互相檢驗他們的紀錄，看看誰的更準確等內容。通過這段史料可知，蒙古國時期確實有記錄君主言行的習慣，《史集》中常提到的「必立克」就是由他們記錄下來的。而這些司職記錄的人就是必闡赤，鎮海即是窩闊台的必闡赤。

23 明·宋濂等，《元史》，卷134〈也先不花傳〉，頁3267。

24 明·宋濂等，《元史》，卷134〈搠思監傳〉，頁4585。

25 宋·彭大雅撰，徐霆疏，王國維箋證，《黑韃事略》，收入《王國維遺書》第13冊，頁2a。

26 巴雅爾，〈關於《蒙古秘史》的作者和譯者〉，載於盧明輝等編，《蒙古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170。

27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第2卷，頁186。

另外從西方遊記中也可以發現這樣的事例。普蘭諾·加賓尼（John of Plano Carpini）來中國謁見貴由汗的時候，曾經說：「教皇陛下信件的譯文，和我對闊連察、拔都的談話記錄，已經由拔都送給他了。」²⁸ 這些談話紀錄是要在貴由汗的宮廷問話中得到驗證的，所以紀錄一定是很嚴肅的，而能夠執筆這些紀錄的也只能是擔任必闍赤的人。被譽為中世紀西方四大遊歷家的鄂多立克（Odorico of Pordenone），其來中國的遊記中，這樣描述他在大汗宮廷中看到的情形：「國王右手是他的將繼位的第一個兒子；下面立著出身於皇室血統者。還有四名書記，記錄皇帝說的話。」²⁹ 鄂多立克到達中國的汗八里城（即北京）應該是在泰定帝時期，他所說的四名書記就是侍衛在大汗身邊的必闍赤。

由以上可以看出，蒙古的前四汗都有自己的必闍赤官來記錄其言行。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以後，皇帝的身邊仍有擔任必闍赤的官員。這和元代擔任起居注官者，基本上都是蒙古和色目人也不無關係。必闍赤官從蒙古國時期就有了記錄大汗言行的職責和傳統，元朝時期必闍赤仍然繼續進行著他們傳統的工作。所以可以認為元代仍然存在著蒙古傳統的宮廷史官，和漢族的史官是並行不悖的。

元代宮廷中進行蒙古傳統史學活動的是必闍赤，而朝廷中這個任務似乎是由蒙古翰林院來完成的。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蒙古翰林院就是元代延續蒙古修史傳統的機構。但是通過一些材料，仍能發現蒙古翰林院在進行著這項工作。本文就試圖揭示蒙古翰林院的這一傾向。

蒙古翰林院的設立，最初是應竇默與王磐之請，「專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學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³⁰ 從《元史》〈百官志〉中看其職能主要是「掌譯寫一切文字，及頒降璽書，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³¹ 似乎與修史並無瓜葛。但是元代與以前不同，國史院歸之於翰林學士院，其官

28（英）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編，呂浦譯，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60。

29（義）鄂多立克（Odorico of Pordenone）著，何高濟譯，《鄂多立克東遊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75。

30 明·宋濂等，《元史》，卷158〈竇默傳〉，頁3732。

31 明·宋濂等，《元史》，卷87〈百官志三〉，頁2190。

員翰林學士承旨、侍講侍讀學士等職都帶兼修國史或同修國史等銜，所以又稱翰林兼國史院。這種情況在元代出現並非偶然，從唐代以後翰林學士參與修史的事情就屢見不鮮。所以元代初期「人們在概念上已自覺地把翰苑與修史聯繫了起來。元代正式以翰林學士院兼掌國史，幾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³² 蒙古翰林院官員的設置、品秩則和翰林兼國史院基本一致。既然翰林國史院中的翰林學士們都已經兼掌史事，蒙古翰林院官參與史事也就不足為奇。

蒙古翰林院中不乏具備史學素養的人才。下面試舉兩例：

1. 阿鄰帖木兒，「善國書，多聞識，歷事累朝，繇翰林待制累遷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英宗時，以舊學日侍左右，陳說祖宗以來及先哲王嘉言善行。翻譯諸經，紀錄故實，總治諸王、駙馬、番國朝會之事。」³³ 首先，通過其翰林待制和承旨均未帶修國史銜，以及總治諸王、駙馬朝會之事，可以確定其為蒙古翰林院官無疑。³⁴ 其次，此人多聞識，並且日侍英宗左右陳說祖宗以來的嘉言善行，可知其瞭解蒙古的歷史。再次，其既善國書，又能翻譯諸經，紀錄故實，則可知其具備修史的基本素養。阿鄰帖木兒曾經受元文宗之命，把明宗說妥歡帖穆爾非其太子的事情寫到《脫卜赤顏》裏。³⁵ 《脫卜赤顏》作為元代皇室的秘密史書，阿鄰帖木兒能夠執筆，本身就說明他是深得皇帝信賴的史官。

2. 諛都刺，「通經史，兼習諸國語。成宗時，為翰林院札爾里赤，職書制誥。……尋授應奉翰林文字，凡蒙古傳記，多所校正。升待制。」³⁶ 「札爾里赤」也就是怯薛執事中的「書寫聖旨，曰札里赤」。³⁷ 能夠擔當此職的只有蒙古翰林院中的寫聖旨必閣赤，³⁸ 所以基本能夠確定諛都刺為蒙古翰林院

32 張帆，〈翰林學士院何時兼修史之任〉，《史學史研究》1990.3(1990.12): 78。

33 明·宋濂等，《元史》，卷124〈阿鄰帖木兒傳〉，頁3047-3048。

34 關於蒙古翰林院的職責及其與內八府宰相的關係，參見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304-305；張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61-64。

35 明·宋濂等，《元史》，卷181〈虞集傳〉，頁4180。

36 明·宋濂等，《元史》，卷192〈諛都刺傳〉，頁4365。

37 明·宋濂等，《元史》，卷99〈兵志二〉，頁2524。

38 參見張帆，〈元代詔敕制度研究〉，載於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

官員。而其能夠多所校正蒙古傳記，則已是參與修史活動了。蒙古傳記應該就是蒙古的功臣列傳，有的學者就認為「翰林院中的蒙古傳記」也是「以國書記錄者」。³⁹ 如果此種推論成立，那麼蒙古翰林院應該可以和蒙古傳統下的修史活動聯繫起來。

但是蒙古翰林院的職掌範圍比較寬泛，它既是負責譯寫文字、書寫聖旨的部門，又是和內八府宰相一起負責諸王朝覲、王爵給授等事的部門。蒙古翰林院的官員也主要是從大汗的怯薛執事中的「札里赤」、「必闌赤」等專員轉化而來，他們在蒙古人看來都是「大根腳」出身，所以他的職責要「較翰林國史院重要」。⁴⁰ 蒙古翰林院的官員由大汗身邊主管文史的必闌赤演變而來，其參與修史活動也就順理成章。

（二）元代《脫卜赤顏》的纂修與蒙古史書

蒙古統治者進入中原以後，仍然堅持蒙古的修史傳統進行《脫卜赤顏》的纂修。《脫卜赤顏》是大蒙古國時期開始纂修的一種官方宮廷史書，最早的一部大約完成於十三世紀中期，後來被明朝人翻譯成《蒙古秘史》並作為四夷館的教材。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歷代都有《脫卜赤顏》的纂修。由於《脫卜赤顏》記錄的都是大汗宮廷的秘密內容，所以外人一般很難見到。元代修《經世大典》時，由於自成吉思汗以來蒙古方面的史料十分缺乏，奎章閣的史官們一度打算取《脫卜赤顏》參閱，但是都遭到拒絕：

奎章閣以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卜赤顏》一書以紀太祖以來事蹟，詔以命翰林學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言：「《脫卜赤顏》事關秘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⁴¹

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⁴²

大學出版社，2002），頁143。

39 李淑華，〈蒙古國書與蒙元史學〉，《黑龍江民族叢刊》2005.1(2005.2): 54。

40 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頁304。

41 明·宋濂等，〈元史〉，卷35〈文宗本紀四〉，頁784。

42 明·宋濂等，〈元史〉，卷181〈虞集傳〉，頁4179。

由以上二例可以看出，元代對於《脫卜赤顏》的管理是非常嚴格的，一般人是根本不可能接觸到它的。正是由於《脫卜赤顏》的這種神秘性，我們今天已經很難知曉它的具體情況了。即使是當時的元朝人，也是知之者甚少。但是元代仍然在進行《脫卜赤顏》的纂修工作也是有跡可尋的。從《元史》中可以檢索到兩條與纂修《脫卜赤顏》有關的材料：

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⁴³

撒迪請備錄皇上登極以來固讓大凡、往復奏答，其餘訓敕、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蹟，命朵來續爲《蒙古脫卜赤顏》一書，置之奎章閣，從之。⁴⁴

由此可以基本清理出元文宗時纂修《脫卜赤顏》的情況。

從《脫卜赤顏》記錄的內容看，它既包括黃金家族譜系的內容，又包括大汗皇位傳遞、皇帝聖訓以及功臣宣力效忠等內容。寫進《脫卜赤顏》的這些內容和《蒙古秘史》中所記錄的內容基本是一致的。可以說元文宗時纂修的《脫卜赤顏》，在內容上是和《蒙古秘史》一脈相承的。

從《脫卜赤顏》的纂修者來看，朵來的情況不太清楚，阿鄰帖木兒和忽都魯篤彌實都是朝廷的高級文官。阿鄰帖木兒是蒙古翰林院的翰林學士承旨，前文對其史官成分已經做過探討，此不贅述。忽都魯篤彌實最初也在蒙古翰林院任翰林學士稱旨，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初立奎章閣時與趙世延同爲大學士。並且元文宗時「以修《經世大典》久無成功，專命奎章閣阿鄰帖木兒、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譯國言所紀典章爲漢語」。⁴⁵則此二人都應該是皇帝身邊的侍從，並且精通蒙文。所以《脫卜赤顏》的纂修者的身分和《蒙古秘史》的纂修者基本也是吻合的。

從纂修《脫卜赤顏》的動機來看，《元史》關於《脫卜赤顏》的內容集中出現在元文宗時並不奇怪。因爲元文宗和明宗同爲武宗之子，兄弟二人圍繞皇位展開了明爭暗鬥，最終文宗通過鬥爭奪得皇位（據說明宗是被其毒死

43 明·宋濂等，《元史》，卷181〈虞集傳〉，頁4180。

44 明·宋濂等，《元史》，卷36〈文宗本紀五〉，頁803。

45 明·宋濂等，《元史》，卷34〈文宗本紀三〉，頁751。

的)。由於文宗繼承皇位並不是很得人心，所以他在鞏固皇位的問題上肯定會不遺餘力。而《脫卜赤顏》正是這麼一部記錄黃金家族歷史的「實錄」，因此文宗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按照自己的意志解釋奪取皇權的事實，並且書之於歷史記載以傳之後世，這是文宗纂修《脫卜赤顏》的動機所在。而這種動機，和十三世紀中期產生的《蒙古秘史》幾乎是如出一轍。

元仁宗時，「姦臣鐵木迭兒爲丞相，威權自恣。〔馬〕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⁴⁶這裏的「國史」應該指的就是《脫卜赤顏》。鐵木迭兒曾出任過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元代監修國史是有權力審查國史《實錄》的，而馬祖常彈劾他盜觀國史，只能是指其偷看《脫卜赤顏》。因爲《脫卜赤顏》除了黃金家族內部成員外，外人是禁止取閱的。鐵木迭兒之所以要盜觀國史，是因爲擔心惡行被記錄在皇家的歷史上，成爲日後被治罪的把柄。那麼這部被盜觀的「國史」上面一定記錄著鐵木迭兒的事情，鐵木迭兒在武宗時就曾經擅自離職赴闕，後因皇太后的庇護才得以脫罪。所以這部《脫卜赤顏》很有可能就是在武宗或者仁宗時修成的。

此外仁宗還曾經命察罕「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⁴⁷這裏的《脫必赤顏》就是《脫卜赤顏》。《聖武開天紀》一書，明代楊士奇編的《文淵閣書目》曾收錄曰：「元聖武開天記一部一冊。」⁴⁸到清代黃虞稷整理《千頃堂書目》時，曾著錄：「皇元太祖聖武開天記一卷。親征錄一卷。記世祖征伐事。以上不知撰人。」⁴⁹據現有材料來看，雖然書名並不完全一致，但是可以肯定兩部書目中著錄的《聖武開天記》應該就是由察罕翻譯的。明代人的著作中基本都沒有提到這部書，估計黃虞稷也是徑直抄錄《文淵閣書目》。現在學術界一般認爲，《聖武開天紀》一書在明中葉就已經亡佚了。察罕是西域板勒紇城人，博學多識，並且精通多種語言。他經常給仁宗皇帝進講歷代帝王故事，

46 明·宋濂等，《元史》，卷143〈馬祖常傳〉，頁3412。

47 明·宋濂等，《元史》，卷137〈察罕傳〉，頁3311。

48 明·楊士奇編，《文淵閣書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頁149。

49 清·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141。

並且還爲仁宗翻譯《貞觀政要》、《帝範》等書，被仁宗呼爲「白雲先生」。仁宗命其翻譯的《脫卜赤顏》應該就是蒙古皇室的「秘史」，至於讓其翻譯的目的或許也是爲了史館修史的需要。但是這裏的翻譯絕不是原文對譯，肯定會有所選擇的，關乎黃金家族內部秘密的事情是絕不允許譯出的。翻譯的主要內容，可能就是「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的赫赫戰功，所以才名其曰《聖武開天紀》。有的學者認爲：「太祖《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紀》；太宗《脫必赤顏》，漢譯爲《太宗平金始末》（或節譯）。」⁵⁰《太宗平金始末》是否譯自《脫必赤顏》，從前面所引的這條史料中得不到答案。《太宗平金始末》一書，早已經不見其蹤影，但是可以斷定窩闊台的《脫卜赤顏》絕對不會是《太宗平金始末》，因爲太宗的戰功不僅僅是平金，而且記錄他的《脫卜赤顏》的內容也不會僅僅局限於一次征服戰爭。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紀年纂要》的情況。元人程鉅夫曾經爲此書作序曰：「近平章白雲翁，以政事餘暇悉取諸家紀載，而集正之一以康節爲準，名曰《歷代帝王紀年纂要》。亦上及羲農者，因備博覽而已。……是書既經乙覽，復徵予序。」⁵¹明代又由黃諫進行續補，並且序之云：

乃元平章白雲翁察罕所編，蓋取皇極經世書爲準。一開卷，而古今成敗國家興衰運祚長短，皆瞭然可見。……蓋免搜索之勞，使人不怖其煩，因年以求運祚修短，則古今國家成敗興衰具見于此。⁵²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收錄了這本由黃諫續補的《紀年纂要》，此書基本屬於一種普及性的史書，⁵³是爲了滿足仁宗瞭解古代歷史而編訂的一部書。因此《紀年纂要》肯定與《脫卜赤顏》無關。《太宗平金始末》可能是譯自《脫卜赤顏》，《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察罕」條即云：「並譯蒙文《脫必赤顏》爲《聖武開天記》、《太宗平金始末》等書。著有《歷代帝王紀

50 甄金，《蒙古秘史學概論》，頁158。

51 元·程鉅夫，〈歷代帝王紀年纂要序〉，《雪樓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卷15，頁8。

52 黃諫，〈帝王紀年纂要序〉，清·查郎阿、劉於義同修，清·許容纂，《甘肅通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據乾隆元年本影印），卷48〈藝文〉，頁4948-4949。

53 關於普及性史書的問題，可參看喬治忠，〈明代史學的普及性潮流〉，載於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4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439-452。

年纂要》。」⁵⁴ 楊志玖也支持此種觀點，並且進一步分析道：「惟《元史》〈察罕傳〉行文將此書列於《開天紀》及《紀年纂要》之後，而《紀年纂要》顯然與《脫卜赤顏》無關，或明初修史者一時疏失也未可知。」⁵⁵

元代文人中也有人隱約知道一些《脫卜赤顏》的情況。如許有壬曾作〈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銘並序〉曰：

……丞相奮庸天造，名具《秘史》，世莫得聞。……僉憲大父也。子孫繁衍，碑不具載。世有恆言，飲水黑河，最爲勳舊，公實與焉。國史曰《脫必赤顏》，至秘也，非有功不紀，公名在焉。……⁵⁶

這裏許有壬也只是聽說而已。但是確實也反映了《脫卜赤顏》神秘性的一面。另外，楊維禎所作樂府詩文的「序」中曾經稱：「按《國史脫必禪》曰，世皇畋於松林，聞婦哭甚哀。明日白翎雀飛集幹耳朵上，其聲類哭婦，上感之，因令侍臣製〈白翎雀辭〉。」⁵⁷ 楊維禎應該也不會看到《脫卜赤顏》，這裏說的《國史脫必禪》或許就是元世祖的《脫卜赤顏》。但是不能認爲元代文人談到的「國史」都是指《脫卜赤顏》，即使是蒙古人「名具國史」也不一定就是指寫到《脫卜赤顏》裏。

從藏族史籍中也可以找到一些線索。由蔡巴·貢噶多吉撰寫的《紅史》一書，其中第八章的內容就是蒙古（元朝）簡述。而在本章的末尾，他寫道：「以上是從《脫卜赤顏》一書中摘要抄錄。」⁵⁸ 蔡巴·貢噶多吉本人曾經在十六歲時（木牛年，西元1324年）進京朝見元泰定帝。這次進京朝見時是否見到過《脫卜赤顏》，現在難以判斷。但是這章的內容中已經寫到了元世祖中統和至元年間的事情，如果確如他所講看到並摘錄了《脫卜赤顏》，那麼元世祖忽必烈的《脫卜赤顏》應該是纂修過的。

除了進行《脫卜赤顏》外，元代還纂修了其他一些蒙古文字的史書。如

54 蔡美彪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頁475。

55 楊志玖，〈元代回回史學家察罕〉，載《何茲全先生八十五華誕紀念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423。

56 元·許有壬，〈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銘並序〉，《圭塘小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1冊），卷10，頁657-658。

57 元·楊維禎，〈白翎雀辭二章並序〉，轉引自甄金，《蒙古秘史學概論》，頁158。

58 元·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陳慶英、周潤年譯，《紅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頁25。

前文提到的，由諳都剌所校正的《蒙古傳記》。還有纂修《經世大典》時，元文宗曾經命令奎章閣阿鄰帖木兒、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譯國言所紀典章為漢語。這些由蒙古文書寫的典章，應該也是繼承蒙古史學傳統而纂修的史書。蒙古國時期，蒙古人就有書寫「札撒」於「青冊」之上的習慣，元朝用國言書寫的典章，就是這種史學傳統的發展。

四、中原王朝體制下的元代官方史學

蒙古國時期，蒙古人就接觸到了中原王朝的官方史學。太宗八年（1236），耶律楚材即「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⁵⁹開始了編修經史的活動。編修所就是蒙古官方的修史機構，但是現在無法確知其修史的具體情況，不過其修當朝史的可能性非常小，可能只是在進行一些遼金史或者古代史書的編輯工作。宋代時，曾經設立編修院，俗稱為「史院」，耶律楚材設立編修所可能也受此影響。忽必烈在金蓮川開幕時，任用大批漢族儒士，很多人經常為其講授中原王朝的歷史，官方的修史傳統，其一定有所耳聞。後來接受王鶚設立翰林國史院的建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一）中原王朝體制下的元代史官與史館⁶⁰

元代繼承了中原王朝的史官與史館制度，但是其設置情況和宋、金又有所不同。元代常設的專職史官主要是起居注，史館主要是指翰林國史院。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屬於官方史學體系內的修史人員和機構。

1. 起居注

元末明初的學者徐一夔認為元代「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⁶¹此說影響極大，明清學者多祖述其說。如明人黃佐的《翰林記》卷13「修實錄」條，《四庫總目》中的《元史提要》，以及《明史》〈徐一夔傳〉和清人朱彝尊的《曝書亭集》〈徐一夔傳〉

59 元·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國朝文類》，卷57，頁15b。

60 關於元代的史官與史館問題，王明蓀曾有專門研究，本節的寫作受其啟發頗多。參見王明蓀，〈元代之史館與史官〉，《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403-420。

61 明·徐一夔，《始豐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9冊），卷6〈與王待制書〉，頁9。

等等都轉引此說法，以致近代的史學史著述也受其影響，如李宗侗的《中國史學史》中就沿襲這種觀點。⁶²其實這種說法並不準確，現代學者對此已多有批評。⁶³

忽必烈即位後，並沒有立即設立起居注。元初，王惲就呼籲設立起居注：「宜令學士院修起居注，逐旋進讀，復置起居舍人、郎等官，使分掌其事。」⁶⁴直到至元五年（1268）時，中書省臣上奏：「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⁶⁵忽必烈才任命和禮霍孫、獨胡刺充翰林侍制兼起居注。至元六年任命左右補闕掌修起居注。至元十年（1273），元世祖命布只兒修《起居注》。至元十五年（1278），元世祖又敕命省、院、臺諸司應聞奏事，必由起居注。至元十六年，升給事中兼修起居注，掌隨朝諸司奏聞事。並且把左右補闕改為左右侍儀奉御兼修起居注。⁶⁶可以看出元初的時候，起居注記錄的內容主要是朝廷中的奏聞之事，並沒有和前代一樣專門記錄皇帝的言動。或許這也跟元代宮廷內部主要由必闈赤來記錄大汗言動有關。這種起居注不記皇帝言動的情況，也引起了朝臣的不滿。如崔彧在至元二十年（1283）曾經上奏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王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⁶⁷韓克昌也曾建言批評這種「起居注不舉其職」⁶⁸的現象。這種情況持續到元英宗時也沒有得到改變。至治二年（1322），御史李端仍然對此事表示不滿：「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

62 李宗侗，《中國史學史》（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頁165。

63 （日）市村瓚次郎，〈元朝實錄及經世大典考〉，載箭內互，《蒙古史研究》附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頁109-110，及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162-163、宋衍申，《中國史學史綱要》（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頁193、張帆，〈元代實錄材料的來源〉，頁68-70、王明蓀，〈元代之史館與史官〉，頁403-413等都有指正。

64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初編》），卷86〈論修起居注事狀〉，頁196。

65 明·宋濂等，《元史》，卷6〈世祖本紀三〉，頁120。

66 關於元代設立起居注和升給事中兼修起居注的時間，〈本紀〉和〈百官志〉中的記載有出入。學術界一般都以〈本紀〉所記為準（如張帆，〈元代實錄材料的來源〉；王明蓀，〈元代之史館與史官〉）。《元史》〈本紀〉主要依靠《元實錄》而來，史料價值自然較高。

67 明·宋濂等，《元史》，卷173〈崔彧傳〉，頁4040。

68 元·張養浩，〈監察御史韓君墓碣銘〉，《國朝文類》，卷55，頁16b。

宜悉書之，以付史館。」⁶⁹

元代擔任起居注的多為蒙古人或色目人，現有材料中沒有發現漢人。張帆從《元史》中一共檢出九位擔任起居注者，⁷⁰王明蓀認為不應該將和禮霍孫、獨胡剌包括在內。⁷¹筆者認為，和禮霍孫和獨胡剌都曾經兼修過起居注，和給事中兼修起居注及左右侍儀奉御兼修起居注一樣，不應該排除在外。至於王明蓀提到的賈居貞，雖然出任過給事中，但此時給事中並未升為兼修起居注，所以自然排除在外。布只兒也曾修過起居注，只是對其情況瞭解太少，但也不能排除。此外，在《元史》中，二人都漏掉了曾經任過給事中的咬驢。下面把《元史》中出現的起居注人選列表一統計如下：

表一 《元史》中所見起居注人選統計表

人 名	籍 貫	遊學與出身	相關史料	史料出處
和禮霍孫、獨胡剌	不詳	不詳	至元五年冬十月……以和禮霍孫、獨胡剌充翰林侍制兼起居注。	卷6〈世祖本紀三〉
布只兒	不詳	不詳	至元十年十一月癸未，命布只兒修《起居注》。	卷8〈世祖本紀五〉
阿魯渾撒理	畏兀人	受業於國師八哈思巴。事裕宗，入宿衛。	（至元）二十一年，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	卷130〈阿魯渾撒理傳〉
堅童	蔑里吉氏	少從王鶚游，入國學，復從許衡遊。入侍禁廷。	弱冠，入侍禁廷，授中順大夫、侍儀奉御。遷中議大夫、同修起居注。（世祖時）	卷134〈闊闊傳附堅童〉
虎都鐵木祿	合魯氏	好讀書，與學士大夫遊，字之曰漢卿。	至元二十八年……帝嘉之，擢給事中。	卷122〈虎都鐵木祿傳〉
月魯帖木兒	卜領勤多禮伯臺氏	讀書強記，年十二，入國學。	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遷給事中、左侍儀、	卷144〈月魯帖木兒

69 明·宋濂等，《元史》，卷28〈英宗本紀二〉，頁625。

70 張帆，〈元代實錄材料的來源〉，《史學史研究》1988.4(1988.12): 70。

71 王明蓀，〈元代之史館與史官〉，《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407。

		仁宗時入宿衛，常侍禁廷。	同修起居注。（仁宗時）	傳〉
咬驢	不詳	不詳	文宗天曆二年三月辛酉，遣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于明宗行在所，仍命……給事中咬驢……等從行。	卷33〈文宗本紀二〉
星吉	河西人	少給事仁宗潛邸	至治初，授中尚監，改右侍儀，兼修起居注。	卷144〈星吉傳〉
野先溥化	札剌兒氏	入宿衛，掌速古兒赤。	特授朝列大夫、給事中，拜監察御史。（順帝時）	卷139〈乃蠻台傳附野先溥化〉
維山	康里氏	侍禁廷	起崇文監丞，擢給事中，遷同僉太常禮儀院事。	卷143〈巉巖傳附維山〉

由表一可以看出，擔任起居注者，基本上都為蒙古、色目貴族。而且他們大多充當過大汗身邊的宿衛，出入禁廷，是深得皇帝信任的。從他們的出身來看，非常類似於出身怯薛的必闡赤。起居注是元代的宮廷史官，必闡赤是為天子主文史者，二者在職能上有一定的關聯。而忽必烈能夠很容易的接受設立起居注的建議，或許也跟蒙古很早就設立必闡赤一職有關，並且擔任起居注者多出身於宿衛，也說明了蒙古人的這點考慮。

元代皇帝接受起居注的觀念，並且認為起居注對自己的行為有一種監督作用，這些也是元代皇帝接受中原王朝修史傳統的表現。如忽必烈曾經在一次打獵時，有一名獵人誤射死名駝，忽必烈欲誅之，但是大臣勸阻說殺人償畜刑太重，忽必烈驚呼曰：「誤耶，史官必書。」⁷² 雖然這段記載可能含有明代漢人史官誇大的成分，但是如果相信此段記載確有其事，那麼忽必烈時期，中原王朝傳統中起居注官的記錄對皇帝的言行是一種監督的觀念還是有一定影響的。元文宗時期也有這樣的記載：

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舛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⁷³

72 明·宋濂等，《元史》，卷125〈鐵哥傳〉，頁3076。

73 明·宋濂等，《元史》，卷185〈呂思誠傳〉，頁4012。

這裏的「國史」應該是指文宗的起居注。因為就呂思誠堅守的「天子不觀國史」的原則來說，應該是不允許皇帝觀閱史官的原始紀錄。唐朝時，唐太宗曾多次向史官提出觀看起居注的要求，並且責問房玄齡曰：「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⁷⁴在元代國學的一次私試策問中就有「卻太宗觀史與卻文宗者孰賢」⁷⁵的題目。由元文宗觀閱起居注未果可以看出，元代君臣接受了中原王朝關於起居注的許多觀念。

2. 翰林國史院

元代與宋、金不同，其國史院併入翰林院之內，稱作翰林兼國史院。翰林國史院的設立時間，有中統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1264）兩種說法。元朝人的記載就有不同，當代學者對此問題也沒有很好的解釋。⁷⁶筆者認為翰林國史院最初設官於中統二年，而官署正式建立則在至元元年。

翰林國史院的設立和儒士王鶚有很大的關係。忽必烈在藩邸時，王鶚就屢次進言儒家治國之道。王鶚本人也非常重視歷史，曾經說過「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⁷⁷王鶚於元世祖即位後即被任命為翰林學士承旨。中統二年七月，王鶚即向忽必烈建議：

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作養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採訪遺事。⁷⁸

並且向忽必烈陳述設立史館的重要性，以及「國亡史存」的道理。忽必烈除了「監修階銜，俟修史時定之」⁷⁹之外，基本採納了他的建議。王恽《中堂事記》中就記錄了此時他和雷膺充任國史院編修官的事情。此外王恽還列舉

74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論文史〉，《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7，頁391。

75 元·吳激，〈私試策問〉，《國朝文類》，卷46，頁6a。

76 參見張帆，〈元代翰林國史院與漢族儒士〉，頁82注釋6。文中列舉幾處史料記載不同處，並且依從王恽中統二年說，但是沒有具體闡述理由，只是指出「對此問題還可作進一步研究」。

77 元·蘇天爵輯撰，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12〈內翰王文康公〉，頁239。

78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紀一〉，頁71-72。

79 明·宋濂等，《元史》，卷206〈王文統傳〉，頁4595。

了當時已除的翰林院與國史院人員名單。⁸⁰此時應該和《元史》〈百官志〉中記錄的一樣「未立官署」，⁸¹只是臨時任命一些翰林院官員充任史職。因為元朝初期，諸制草創，這種「因事設官，官不必備」⁸²的現象並不罕見。此後幾年，王鶚一直在領導元朝的修史事業。中統三年（1262）八月，朝廷「敕王鶚集廷臣商榷史事，鶚等乞以先朝事蹟錄付史館」。⁸³中統四年四月，「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⁸⁴但此時所言史館，可能只是在元上都設立的一個臨時機構，由任命的幾個編修人員負責。直到至元元年（1264）二月，朝廷才「敕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⁸⁵可見此時已經決定設立館舍，並且由政府撥款修史了。當年九月，正式設立翰林國史院。這也就是《元史》〈百官志〉認為至元元年始置的原因。此時翰林國史院的辦公地點可能一直在上都。王惲《中堂事記》中記其是作為燕京行中書省官員赴上都，後被徵召進入國史院。

元初的大都城，由於戰爭的破壞，已經殘破不堪，世祖中統元年（1260）車駕來燕京時，也只能駐蹕近郊。中統五年（1264），元朝政府下詔，加號開平府為上都，然後「始於燕京修營宮室，分立省部」，「至元四年二月己丑，始於燕京東北隅，辨方位，設邦建都，以為天下本。」⁸⁶當年四月，於新都鳳池坊北立中書省。中統五年，翰林國史院可能已經在大都設分省了。陳學霖認為在此年翰林國史院已經轉移到了新都城（大都）。⁸⁷最遲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時，翰林院已經有南北新舊二院之設了。《元史》〈祭祀志〉記載至元十六年（1279）太祖、太宗、睿宗的「御容」都是置於翰林院中

80 參見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82〈中堂事記下〉，頁11a。

81 明·宋濂等，《元史》，卷87〈百官志三〉，頁2189。

82 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40〈經世大典序錄·治典·官制·各行省〉，頁9b。

83 明·宋濂等，《元史》，卷5〈世祖本紀二〉，頁86。

84 明·宋濂等，《元史》，卷5〈世祖本紀二〉，頁92。

85 明·宋濂等，《元史》，卷5〈世祖本紀二〉，頁96。

86 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朝堂公宇」條，頁8。

87 Hok-Lam Chan,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 Chin, and Sung Histories," in John D. Langlois Jr.,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65.

的。而到至元二十四年二月時，「翰林院言舊院屋敝，新院屋才六間，三朝御容宜於太常寺安奉，後仍遷新院」。⁸⁸可見此時已有新舊二院之設了。成宗元貞元年（1295）時，因為修《實錄》，就把官署移到北中書省內。⁸⁹但是翰林國史院後來又搬回南省辦公。武宗至大二年（1309）九月，尚書省官員上奏：「翰林國史院，先朝御容、實錄皆在其中，鄉置之南省。今尚書省復立，倉卒不及營建，請買大第徙之。」⁹⁰此時的翰林國史院應該還在南省。至大四年（1311），又命翰林院移署舊尚書省。直到「至順二年七月十九日，中書省奏，奉旨：翰林國史院裏有的文書，依舊北省安置，翰林國史官人就那裏聚會。繇是北省既為翰林院，尚書省為中書都堂省固矣。」⁹¹翰林國史院的官署才算徹底穩定下來。其具體方位應該在「鳳池坊北部，鐘樓之西，即在流向壩河的高梁河東支（今護城河）南岸。」⁹²

元代的情況特殊還在於國史院歸於翰林學士院門下。因此在設立時間上容易把翰林院和國史院糾纏在一起。中統元年，任命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即可認為是翰林學士院初設之時。如前所述，中統二年又設國史院。此時國史院是設立於翰林院之下。翰林院也就兼有修史之任了。⁹³所以元人著作中出現翰林國史院設立時間不同，也就不足為怪。

元代翰林國史院主要職能為「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⁹⁴張帆對此已有論述。⁹⁵薩兆澍進一步指出，元代翰林國史院還在「選拔推薦人才；撰修遼、金、宋史和元典章實錄；興國學，開科考取士；以及促進各民族文士之間的團結和友誼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⁹⁶王明蓀梳理出翰林國史院的八種職掌，分別為：諮詢與審議、祭祀、典藏、賜宴之所、經筵、薦官、文

88 明·宋濂等，《元史》，卷75〈祭祀志四〉，頁1877。

89 元·王恽，《秋澗先生大全集》，卷33〈院中即事〉，頁6b。

90 明·宋濂等，《元史》，卷23〈武宗本紀二〉，頁516。

91 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朝堂公宇」條，頁8-9。

92 薩兆澍，〈元翰林國史院地理方位辨正〉，《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0.6(2000.12): 72。

93 張帆，〈元代翰林國史院與漢族儒士〉，《北京大學學報》1988.5(1988.9): 76。參看元·胡祇通，《紫山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6冊），卷9〈翰林院廳壁記〉與〈國史院廳壁記〉，頁1-5。

94 明·宋濂等，《元史》，卷8〈世祖本紀五〉，頁165。

95 張帆，〈元代翰林國史院與漢族儒士〉，《北京大學學報》1988.5(1988.9): 76。

96 薩兆澍，〈元翰林國史院述要〉，《北京行政學院學報》1999.1(1999.6): 66。

書工作、修史等。⁹⁷綜合各家觀點，基本可以認清元代翰林國史院的職能所在。由於元代是以翰林院兼國史院，所以宋、金時期的翰林院與國史院的職能，在元代都集中於翰林國史院。除了以上列舉的基本職掌外，翰林國史院的官員還會有一些臨時的任命。例如郝經，曾經以翰林侍讀學士充當國信使，出使宋朝。再如陳孚，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身分，作為梁曾的副使出使安南。⁹⁸

3.其他史官與修史項目

在元代的常設史官和修史機構中，除了起居注和翰林國史院外，還有其他一些修史項目與史官。主要是時政記和秘書監中的著作郎與著作佐郎。

左、右司是元代宰相的重要輔佐機構。元世祖中統元年，始置左右司。至元十五年（1278），又分置兩司。左、右司分房、科治事，其中左司分六房三十一科，右司分三房十七科。其中左司吏禮房第六科曰時政記。關於元代時政記的修纂情況，由於材料缺乏已很難知道它的具體情況。但是時政記的確成為日後國史院修纂實錄的重要依據。王惲的〈進實錄表〉中就稱實錄的纂修主要是「采摭於時政之編，參取於起居之注」。⁹⁹另外，王約在成宗即位後，即上言二十二事，其中就提出：「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¹⁰⁰唐宋時期，主要由宰相來記時政記。元代左右司是宰相的重要助手，由其來修時政記也是有一定淵源的。另外在金代左右司也兼記起居注，具有史官的色彩，元代雖不兼起居注，但保留修時政記的職責，也是對金代制度的一種變通。

元代在秘書監中設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他們主要是參與了《元一統志》的修纂。元代的秘書監主要職責為「掌歷代圖籍並陰陽禁書」，¹⁰¹這和宋、金制度都有不同。宋代於秘書省下設日曆所，由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金代秘書監下設著作局，由著作郎和著作佐郎掌修日曆。而元代著作郎和著作佐郎沒有參與日曆的修纂，王明蓀對此問題已有研究，此不贅述。¹⁰²元代是

97 王明蓀，〈元代之史館與史官〉，《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416-417。

98 明·宋濂等，《元史》，卷190〈陳孚傳〉，頁4339。

99 元·王惲，〈進實錄表〉，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16，頁6a。

100 明·宋濂等，《元史》，卷178〈王約傳〉，頁4138。

101 明·宋濂等，《元史》，卷90〈百官志六〉，頁2296。

102 王明蓀，〈元代之史館與史官〉，《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410-413。

否有日曆的纂修，目前還沒有確定的答案。張帆認為，元代官修當代史中沒有日曆這一體裁，但是起居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日曆的作用。另外，元代翰林國史院也從事一些大體上接近於日曆的編纂活動。¹⁰³而王明蓀則認為，張帆的論據不能支持其論點，元日日曆應該是由起居注官完成的。¹⁰⁴筆者以為，以上研究都拘泥於由起居注而日曆而實錄這樣一套修史體制而來。但是實錄的修纂並非沒有日曆就無法完成。例如在明代，起居注和日曆都是幾設幾廢，但是明代實錄仍然修得比較完整。¹⁰⁵而且明代的修史制度多模仿元代，明代既然沒有日曆能修成實錄，元代又有何不可？同樣清代沒有日曆的編纂，但也完成了實錄的修纂任務。¹⁰⁶筆者拙見，在沒有充分材料證明的情況下，任意猜測元代由誰來修纂日曆的做法並不可取。

（二）中原王朝體制下的元代官方史學纂修活動

元代官方的修史活動比較活躍，主要集中在實錄、政書、典志、前朝史等方面。從這些修史項目上來看，也大多是沿襲中原王朝官方史學的傳統路數。目前學術界關於元代官修史書的各個方面都有所探討，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概述其纂修的基本情況。

1. 元代實錄的纂修

纂修實錄是元代官方史學的一項重要內容。元代實錄的纂修情況，前賢已有探究。¹⁰⁷關於實錄纂修概況首先列表二如下：

103 張帆，〈元代實錄材料的來源〉，《史學史研究》1988.4(1988.12): 70-71。

104 王明蓀，〈元代之史館與史官〉，《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413。

105 參見謝貴安，《明實錄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50-66。

106 參見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1-21。

107 參見清·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649-652；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頁141-145；市村瓚次郎，〈元朝實錄及經世大典考〉，頁104-114；葉幼泉、王慎榮，〈元朝《實錄》修纂的經過及存在的問題〉，《學術研究叢刊》33(1985.1): 36-42，及〈《元史》探源——兼評《元史》的史學價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文史》第27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77-194；邱樹森，〈關於《元史》修撰的幾個問題〉，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系，1987），頁54-63；張帆，〈元代實錄材料的來源〉，《史學史研究》1988.4(1988.12): 68-71；王慎榮，〈對《元史》本紀史源之探討〉，《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9.5(1989.9): 7-10等。

表二 元代實錄纂修表

名稱及卷數	附帶項目	撰修者	備 註
太祖實錄		國史院	
太宗實錄		國史院	
睿宗實錄		國史院	
定宗實錄		國史院	
憲宗實錄		國史院	
世祖實錄 210卷	事目54卷、聖訓6卷	王構、王惲、姚燧、趙孟頫、高道凝、張昇、李之紹	監修：董文用、張九思。另有，金書《世祖實錄節文》1冊，漢字《實錄》80冊
裕宗實錄			修纂經過同《世祖實錄》
成宗實錄56卷	事目10卷、制詔錄7卷	程鉅夫、鄧文原、元明善、暢師文	由玉連赤不花奏進
順宗實錄1卷		程鉅夫、鄧文原、元明善	修纂經過同《成宗實錄》
武宗實錄50卷	事目7卷、制詔錄3卷	程鉅夫、元明善、楊載	
仁宗實錄60卷	事目17卷、制詔錄13卷	袁桷、元明善、廉惠山海牙、曹元用	
英宗實錄40卷	事目8卷、制詔錄2卷	謝端、吳澄、廉惠山海牙、曹元用、馬祖常、蘇天爵	
顯宗實錄			同《英宗實錄》同時開修
泰定帝實錄		王結、張起岩、歐陽玄、成遵	
明宗實錄		王結、張起岩、歐陽玄、謝端、成遵、蘇天爵	
文宗實錄		歐陽玄、張起岩、謝端、蘇天爵、成遵	
寧宗實錄		謝端、歐陽玄	

上表是充分吸收前賢的研究結果而成。其史料來源主要為《元史》列傳及《國朝文類》中收錄的四篇〈進實錄表〉。其他材料中查到的，如姜天麟曾參與修纂《英宗實錄》，¹⁰⁸黃清老曾參與修撰《明宗實錄》¹⁰⁹等，本表概不列入。此外對有爭議的幾人，如申屠致遠，¹¹⁰《元史》本傳稱其「元貞元年，纂修《世祖實錄》，召為翰林待制，不赴」，¹¹¹本表不與列入。如蘇天爵，一般都認為其預修《武宗實錄》，而沒有修纂《英宗實錄》、《明宗實錄》，但是根據姚景安之研究，此事不確，本表暫依姚說。¹¹²如馬紹、李謙、李術魯翀，¹¹³《元史》中只提到馬紹、李謙推薦李之紹預修《世祖實錄》，而並沒有說明二人參與修纂，李術魯翀本傳只提到「會修《世祖實錄》，燧首以翀薦」，¹¹⁴但是所列時間在大德十一年（1307）後，因此本表對此三人也不收錄。再如周伯琦，¹¹⁵《元史》本傳中只是稱其預修后妃、功臣列傳，本表也暫不收錄。

元代實錄的修纂要受到監修大臣和皇帝的嚴格審查。一般程序是先用漢文纂修初稿，然後譯成蒙文上奏，經過審查和修改後，才能最終纂定，藏之史館。如前五朝實錄的修纂，忽必烈即位之初就由王鶚負責採訪先朝事蹟錄付史館，並開始進行纂修實錄的先期活動。至元元年（1264）時，王鶚就上奏：

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亡，宜置局纂就實錄，附修遼、金二史。¹¹⁶

108 元·宋瑩，〈從仕郎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姜君墓碣銘〉，《燕石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2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清抄本影印），卷14，頁218。

109 元·蘇天爵，〈元故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黃公墓碑銘並序〉，《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3，頁210。

110 王慎榮〈對《元史》本紀史源之探討〉中認為其預修《世祖實錄》（頁8），邱樹森〈關於《元史》修撰的幾個問題〉及葉幼泉、王慎榮〈元朝《實錄》修纂的經過及存在的問題〉均不加著錄。

111 明·宋濂等，《元史》，卷170〈申屠致遠傳〉，頁3990。

112 參見元·蘇天爵輯撰，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前言」。

113 前引邱樹森文認為其預修《世祖實錄》（頁56），前引葉幼泉、王慎榮等文均不加著錄。

114 明·宋濂等，《元史》，卷183〈李術魯翀傳〉，頁4219。

115 前引邱樹森文認為其預修《泰定實錄》、《寧宗實錄》（頁56），前引葉幼泉、王慎榮文均不加著錄。

116 明·宋濂等，《元史》，卷160〈王鶚傳〉，頁3757。

此時已經準備開局纂修《太祖實錄》。至元二十三年（1286）翰林承旨撒里蠻進奏：「國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以畏吾字翻譯，俟奏讀然後纂定。」¹¹⁷ 這就為以後實錄纂修定下了基本原則。至元二十五年（1288），撒里蠻向忽必烈進讀翻譯成蒙文的《祖宗實錄》，元世祖審查後認為：「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¹¹⁸ 此次纂修，世祖並不滿意。此後分別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六月和十一月，國史院又奏進改修過《定宗實錄》和《太宗實錄》。此後仍然在不斷改進。至成宗纂修《世祖實錄》時，仍然還在進行前五朝實錄的修改。成宗元貞元年（1295），由董文用奏進新修成的漢文《世祖實錄》。元貞二年，兀都帶把改定後的《太宗實錄》、《憲宗實錄》和剛剛纂定的《世祖實錄》一起翻譯成蒙文奏進。成宗鐵穆耳審查後認為：

忽都魯迷失非昭睿順聖太后所生，何為亦曰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計月日先後差錯。又別馬里思丹砲手亦思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書耶？¹¹⁹

昭睿順聖太后即為世祖皇后弘吉剌氏。這時，成宗對《世祖實錄》顯然不太滿意，因此又經過一段時間的修改。直到大德七年（1303），才由翰林國史院把最終修訂完的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一齊奏進。

修《世祖實錄》時，還由王惲完成《聖訓》六卷，以後只稱《制詔錄》。另外在成宗大德八年（1304），還由翰林學士承旨撒里蠻進金書《世祖實錄節文》一冊、漢字《實錄》80冊。王慎榮等人認為此金書節文可能是畏吾爾文，瞿林東認為，「金書」可能用的是「國言」，「節文」大約就是事目。¹²⁰ 筆者認為，此次進奉的應該是一種實錄的節要本。文字當然用的是成宗能夠看懂的蒙古文字。元代這種專供皇帝閱讀的節要書非常多，成為皇帝學習知識的重要讀物。如大德十一年（1307）「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

117 明·宋濂等，《元史》，卷14〈世祖本紀十一〉，頁294。

118 明·宋濂等，《元史》，卷15〈世祖本紀十二〉，頁309。

119 明·宋濂等，《元史》，卷19〈成宗本紀二〉，頁407。

120 參見王慎榮，〈對《元史》本紀史源之探討〉，頁8，及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575。

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¹²¹ 仁宗曾命元明善「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¹²² 《世祖實錄節文》應該也是爲了給皇帝瞭解祖宗功業的簡要讀本。「金書」應該指的是一種裝幀精美的文本。王惲〈進實錄表〉只稱「用黃綾夾複封全」，¹²³ 此時可能經過繕寫，然後裝幀精美呈上。元代不乏用金泥寫書的例子，如英宗時，就曾「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¹²⁴ 並命吳澄作序。把二百一十卷的漢字《實錄》繕寫成80冊上進是可能的，但是要把五十四卷的《事目》繕寫成一冊上進則是相當有難度的。因此筆者認爲「節文」不可能是《事目》。

2. 元代典志書與前朝史的纂修

元代十分重視典章制度和法律文書的編纂。元末孔齊的《至正直記》「國朝文典」條記載：

大元國朝文典，有《和林志》、《至元新格》、《國朝典章》、《大元通制》、《至正條格》、《皇朝經世大典》、《大一統志》、《平宋錄》、《大元一統紀略》、《元眞使交錄》、《國朝文類》、《皇元風雅》、《國初國信使交通書》、《后妃名臣錄》、《名臣事略》、《錢唐遺事》、《十八史略》、《後至元事》、《風憲宏綱》、《成憲綱要》，……中間惟《和林》、《交信》二書，世不多見。吾藏《和林》，朱氏有《交信》三四書，未知近日存否？¹²⁵

其中很多書沒有著錄到明代楊士奇所編的《文淵閣書目》中，估計到明中期就已經亡佚了。這些書中大量的的是元代官方編纂的典章制度和法律文書。關於這些書的編纂情況，學術界已經有許多研究成果。除了孔齊著錄的這些以外，元代還編纂了關於政要的《六條政類》、關乎農業生產的《農桑輯要》等書。這些都是元代官方史學中經世致用思想的體現。這種經世思想更明顯的體現在《皇朝經世大典》的編纂上。¹²⁶ 《經世大典》分帝號、帝訓、帝制、帝系、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十篇，共八百八十卷。其中前

121 明·宋濂等，《元史》，卷24〈仁宗本紀一〉，頁536。

122 明·宋濂等，《元史》，卷181〈元明善傳〉，頁4172。

123 元·王惲，〈進實錄表〉，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16，頁6b。

124 明·宋濂等，《元史》，卷171〈吳澄傳〉，頁4012。

125 元·孔齊，《至正直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26。

126 蘇振申，《元政書《經世大典》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一書，對《經世大典》的纂修、亡佚、輯佚等問題均有詳細論述。

四篇爲君事，後四篇爲臣事。從現存的《經世大典》〈序錄〉中，可以看出《經世大典》的編纂強烈的體現出一種「總結當代典制，經世治平的歷史認識」。¹²⁷

元朝政府除了編纂大部頭的《經世大典》之外，還編纂了記載御史臺發展沿革的《憲臺通紀》、《南臺備要》，以及秘書監的部門專史《秘書監志》，此外還有號稱太常「實錄」的《太常集禮》等書。這些書籍的編修，體現出元朝政府記錄本朝故實，以爲後世備考的一種積極的史學意識。《秘書監志》中還記載了關於元代重要志書《元大一統志》的纂修情況。《元大一統志》等方志類史書的編纂，是元朝政府出於統治空前遼闊土地的需要而成。同時也體現了一種空前大統一的皇朝的恢宏氣勢。元代編纂的這些典制和志書，在中國史學史上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其中很多書都成爲明朝修纂《元史》的重要史料來源。雖然其中很多書後來逐漸亡佚，但是通過《元文類》、《永樂大典》等類書保存下來的內容，成爲我們今天研究元朝歷史的重要依據。

此外，元代仍然沿襲了中原王朝爲前朝修史的傳統，完成了遼、金、宋三史的纂修。元朝建立後，忽必烈即下詔儒臣王鶚等人纂修前朝史。但是由於在正統問題上的糾葛，三史遲遲未能修成。直到至正三年（1343），元順帝才正式下詔開局纂修三史，並且任命中書右丞相脫脫爲總裁官。由於脫脫提出了三史「各與正統」的做法，暫時平息了正統之爭，所以在至正五年（1345）三史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修纂完成了。雖然三史的纂修在短時間內迅速完成，還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是元代能夠充分利用掌握的史料最終完成三史，不僅使中原王朝纂修前朝史的傳統得以延續，而且也爲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五、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元代作爲第一個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在官方史學上既採行中原王朝的一套修史體制，又堅持本民族的一套修史體制。元代官方史學的兩重體制也有相通之處，比如在起居注的設置

¹²⁷ 周少川，《元代史學思想研究》，頁174。

上，一方面是學習中原王朝的記注制度，另一方面也是受蒙古傳統必閣赤制度的影響。

元代的這種兩重體制對於中國古代官方史學發展有著重要意義。由於元代堅持兩重體制並行，所以在其學習中原王朝的修史體制時，也會糅合進本民族的因素。在修史格局上，宋代不僅修史機構疊床架屋而且修史項目繁瑣重複；元代則沒有照搬宋代的做法，而是簡化了許多機構與修史項目。同時元代既把翰林院與國史院合併而稱翰林兼國史院，又設立了蒙古翰林院。翰林國史院的成立也影響了明清兩代的修史機構設置。在《元一統志》及《元典章》的編纂上，元代也為明清《一統志》和《會典》的纂修提供了許多借鑒。而元代堅持民族特色，使蒙古體制下的史學得以延續和發展也為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創造了一種多民族史學的特色。元代在官方史學上開創的這種兩重體制，為後來同樣是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提供了可資借鑒之處。

總之，元代既繼承了蒙古草原制度下的一套官方史學體制，又吸收了中原王朝的一套官方史學體制。元代官方史學的這種兩重體制，是元代區別於其他中原王朝的重要特點。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

宋·彭大雅撰，徐靈疏，王國維箋證，《黑韃事略》，收入《王國維遺書》第13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

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四部叢刊初編》第329-331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元·蘇天爵輯撰，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

元·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元·熊夢祥，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元·王恽，《秋澗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初編》第224-227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 元·許有壬，《圭塘小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元·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陳慶英、周潤年譯，《紅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
- 元·宋褰，《燕石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2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清抄本影印。
- 元·孔齊，《至正直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李志常撰，王國維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收入《王國維遺書》第13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
- 元·程鉅夫，《雪樓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徐一夔，《始豐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清·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清·查郎阿、劉於義同修，清·許容纂，《甘肅通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據乾隆元年本影印。
- 清·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
- 額爾登泰、烏雲達賚校勘，《蒙古秘史校勘本》，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 （英）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編，呂浦譯，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 （義）鄂多立克（Odorico of Pordenone）著，何高濟譯，《鄂多立克東遊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二、近人論著

- 王明蓀 1991 〈元代之史館與史官〉，《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青峰出版社，頁403-420。
- 王愼榮 1989 〈對《元史》本紀史源之探討〉，《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9.5 (1989.9): 7-10。
- 王曉欣 1996 《一代天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日)市村瓚次郎 1932 〈元朝實錄及經世大典考〉,收錄於(日)箭內互著,《蒙古史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 白鋼主編,陳高華、史衛民撰 1996 《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亦鄰真 1985 〈《元朝祕史》的流傳與價值〉,《文史知識》1985.3(1985.3): 32-37。
- 宋衍申 1992 〈《中國史學史綱要》〉,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 余大鈞 1982 〈《蒙古祕史》成書年代考〉,《中國史研究》1982.1(1982.2): 144-159。
- 李宗侗 1984 《中國史學史》,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 李治安 1992 《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李治安 2003 《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李治安、王曉欣 1989 《元史學概說》,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 李淑華 2005 〈蒙古國書與蒙元史學〉,《黑龍江民族叢刊》2005.1(2005.2): 50-55。
- (蒙古)沙·比拉著,陳弘法譯 1988 《蒙古史學史》(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 邱樹森 1987 〈關於《元史》修撰的幾個問題〉,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系,頁54-63。
- 周少川 2001 《元代史學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金毓黻 2000 《中國史學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烏雲高娃 2001 〈國內關於《蒙古祕史》的研究概況〉,《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3(2001.3): 16-21。
- 張帆 1988 〈元代實錄材料的來源〉,《史學史研究》1988.4(1988.12): 68-71。
- 張帆 1988 〈元代翰林國史院與漢族儒士〉,《北京大學學報》1988.5(1988.9): 75-83。
- 張帆 1990 〈翰林學士院何時兼修史之任〉,《史學史研究》1990.3(1990.12): 77-78。
- 張帆 1997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帆 2002 〈元代詔敕制度研究〉,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梁啓超 2000 《中國歷史研究法》,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喬治忠 1994 《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 喬治忠 2002 〈明代史學的普及性潮流〉，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4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 喬治忠 2005 〈中國古代官方史學的興盛與當代史學新機制的完善〉，《河北學刊》2005.2(2005.3): 174-181。
- 楊志玖 1997 〈元代回回史學家察罕〉，載《何茲全先生八十五華誕紀念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葉幼泉、王慎榮 1985 〈元朝《實錄》修纂的經過及存在的問題〉，《學術研究叢刊》33(1985.1): 36-42。
- 葉幼泉、王慎榮 1986 〈《元史》探源——兼評《元史》的史學價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文史》第27輯，北京：中華書局，頁117-194。
- 甄 金 1996 《蒙古秘史學概論》，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 (日) 箭內互著，陳捷、陳清泉譯 1993 《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上海：商務印書館。
- 劉 曉 2006 《元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蔡美彪主編 1986 《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盧明輝等編 1984 《蒙古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穆德全 1984 〈論元代史學的成就〉，《史學月刊》1984.4(1984.7): 30-35。
- 謝貴安 2003 《明實錄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 瞿林東 1999 《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
- 薩兆滙 1999 〈元翰林國史院述要〉，《北京行政學院學報》1999.1(1999.6): 66-70。
- 薩兆滙 2000 〈元翰林國史院地理方位辨正〉，《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0.6(2000.12): 72-74。
- 蘇振申 1984 《元政書《經世大典》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 Chan, Hok-Lam. 1981.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 Chin and Sung Histories," in John D. Langlois Jr.,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56-106.

Analysis on the Dual System for Compiling Official History in the Yuan Dynasty

Peilei Shi*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wo systems for the compiling of official history that existed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Yuan dynasty's dual political system was the reason for this dual compiling system. In the first system, the Yuan Palace continued the Mongolian tradition of compiling history by setting up an official entitled Bishechi 必闡赤, who had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cording the emperors' words and deeds and compiling the history book *Tuobuchiyan* 脫卜赤顏. In the second system, the Yuan followed the Chinese tradition in setting up Qijuzhu 起居注 and Guoshiyuan 國史院 to compile records of political happenings, books of the Emperors' daily activities, histories of previous dynasties, books on political systems, and local chronicles. Because of this dual system for compiling history,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is unique among official histories from ancient China.

Keywords: Yuan dynasty, Mongolia, historical studies, dual system, Bishechi 必闡赤, *Tuobuchiyan* 脫卜赤顏

* Peilei Shi is a Ph.D. student being trained in both the College of History at Nankai University in Tianjin, as well as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Aichi University in Japan.